

推动与引领：《社会学研究》 三十年来的方法研究论文回顾

风笑天

提要：本文以《社会学研究》所发表的社会研究方法论文为线索，从方法论、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等几个大的方面，系统回顾和评述了三十年来《社会学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方法论文中最为重要的研究主题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并对介绍和评价新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了综述。本文认为，《社会学研究》及其所发表的社会研究方法的论文在推动和引领国内社会研究方法领域的不断进步、促进国内社会研究水平的迅速提高上，做出了积极的、不可或缺贡献。同时，文章也对《社会学研究》杂志提出了两点期望。

关键词：社会研究方法 方法论 社会调查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作为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本社会学学术期刊，《社会学研究》杂志走过了它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笔者作为较早投身于社会学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社会方法研究的学者之一，亲身经历了这一发展过程。众所周知，由于社会学学科发展在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性，导致在《社会学研究》创刊至今的三十年里，国内社会学界长期面临着全国仅有一本纯粹的社会学学术期刊的局面。^①这一境况也使得它承担起了更多的学术使命。特别是在社会研究方法领域，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三十多年来，除了少量散见于其他社会科学期刊的方法研究论文外，社会学界最为重要的方法研究论文基本上都发表在了《社会学研究》杂志上，这一点正是《社会学研究》杂志对社会研究方法领域的最大贡献，也是对社会学界提高社会研究质量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社会研究方法“既是社会学知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基础支柱之

① 当然，上海大学编辑出版的《社会》杂志也是目前另一本纯粹的社会学专业期刊。它甚至比《社会学研究》创刊的时间还要早。只是因为该刊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办刊方向有所转变，学术性有所下降，接近通俗刊物，而不能算作纯粹的学术刊物，故笔者此处如此表述。

一,同时也是社会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来说最具特色和优势的学科领域”(风笑天,2015:312)。据中国知网统计,截止到2015年第6期,《社会学研究》三十年来共发文2885篇,扣除条目中属于学界消息、简讯、会议综述、相关院系所简介、中国社会学大事记、投稿指南、征订启事、每年论文总目录等非学术论文的条目,其发表的学术论文总数估计在2300篇左右,其中社会研究方法方面的论文有96篇,大约占全部论文的4.2%左右。平均来看,大约每年发表的方法论文在3篇左右。在本文中,笔者将以《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这些方法方面的论文为线索,从下列几个大的方面来回顾和综述社会学界三十年来在研究方法上最为重要的研究主题及其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点期望。

一、方法论层面的研究

方法论(methodology)既涉及社会研究的哲学与逻辑基础,也涉及社会研究的规则和程序体系。三十年来,《社会学研究》不仅发表了一批从哲学与逻辑基础层面对社会研究方法论进行探讨的论文,也发表了一些从规则和程序体系层面进行探讨的研究论文。

首先,围绕着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反实证主义方法论,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李小方从分析狄尔泰到韦伯的思想演变入手,阐述了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产生背景、思想演变及其对西方社会学的影响,并对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批判性的分析。作者指出,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是在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矛盾和对立中产生并发展的。它在方法论方面的积极探索,比如提出社会研究的特殊性问题、文化背景与意义问题、社会科学概念的有限范围问题等,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作者同时认为,实证方法和非实证方法都应在社会认识的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研究者不能扬此抑彼,在互补的二元之间做惟一的选择(李小方,1988)。

张小山从统一科学观的缺失、决定论原则的谬误、价值中立观的幻想三个方面,系统评述了二战后流行的各种反实证主义思想流派对实证主义社会学提出的责难。作者指出,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对立突出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而这又根源于两派在本体论上的不同。实证主义虽然是社会学的主流,但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将

社会学完全自然科学化,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社会研究者既要看到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和思想的制约力,也要看到社会生活中个人所具有的主体性特点。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批判地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各种流派,不可轻易地偏执于其中任何一方(张小山,1991)。

林彬(1992)通过对近几十年社会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系统考察,认为方法论、研究方法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随着实证主义方法论和西方主流社会学的衰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调查方法更为多样化,社会学方法论更具综合性。蔡禾、赵巍(1994)对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传统以及我国社会学界在认识上所存在的误区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尽管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传统由来已久,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学是一门实证学科。反实证主义同样在社会学中有它的地位和历史。侯钧生(1995)主要讨论了与价值相关的问题。他认为,韦伯的“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时并存的两个方法论原则,它们既对立又统一,二者异曲同工,目的都是要求研究者将“形而上学”和世界观的认识从科学活动与科学结论中清除出去,以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风笑天,2015:316)。

其次,最近十年中对方法论的探讨相对集中地体现在对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关系或因果分析及其证明上。王天夫的《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一文,从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引出了因果分析的重要性,探讨了确立因果关系的标准、因果分析的各种类型、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中的因果分析以及因果关系的秩序等问题。作者试图提供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的概念,并结合当前社会研究中的某些不足给出应用因果分析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技术。作者认为,挖掘因果机制是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科学知识积累和学科建设的核心。因果分析有层次之分,不同的学科所关注的重心并不一致。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在使用资料的类型和分析资料的手法上有相当的差异,但是,它们在应用因果分析以达成具有普遍性和解释力的结论上是一致而没有区别的(王天夫,2006)。

彭玉生几乎采用了与王天夫完全一样的论文标题,从另一个侧面再次探讨了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作者从回顾因果问题的哲学讨论以及方法论逻辑入手,系统探讨了统计模型与个案分析方法的优劣,强调了理论抽象在因果解释中的重要作用,讨论了各种因果分析方

法的共同逻辑和社会科学研究应用中的误区。该文力图澄清因果关系的理论,阐述因果命题与相关分析的联系。文章还提出了理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相结合的三点定位原则。作者认为,理论、定性和定量各有自身的逻辑和优势,三者结合才能相得益彰。从经验观察到理论,再从理论到经验检验,这是认识过程的两个步骤,缺一不可。理论结合个案分析提出假设,再以统计数据检验之,有助于面对统计结论的事后解释,这是三点定位原则最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未必三方面论证都在同一项研究中完成。随着科学理论不断发展,人类对因果机制的解释也会越来越深入(彭玉生,2011)。

张杨在《证伪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吗?》一文中,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能否作为社会科学所遵循的方法论准则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把穆勒所揭示的求同法、共变法和剩余法等研究方法进行因果性解释时的逻辑困境总结归纳为三个问题,即他因性问题、共因性问题以及多因性问题,并以最简单的社会科学命题为例来讨论这三类问题对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挑战。作者认为,成熟的理论由核心命题和辅助假说共同构成,而辅助假说决定了证伪的困难性;对于社会科学命题,其因果关系可能包含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或者说多因性问题与共因性问题的存在进一步使得简单证伪不可能;对于概率性质的社会科学命题,不可能单个反例证伪。总之,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我们不能草率地使用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来检验理论的适用能力,更不能把可证伪性拔高到科学与非科学的判断标准的层次(张杨,2007)。

第三,除了上述哲学和逻辑层面的探讨外,近十几年来方法论探讨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开始对定性研究方法予以一定的关注。特别是西方社会学中流行的女性主义方法论也因其独特的视角和命题模式成为近些年来国内方法论研究中的另一个热点。

熊秉纯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国内社会学研究进行反思,并引入社会性别的视角,主张摒弃空洞的词汇,以具体的材料、解析和批判的视角来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并重新检视、整合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作者从知识的内涵、知识的建构过程、知识建构的参与者三个方面来说明定性研究方法对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并以社会学界在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过程中的问题以及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为起点,通过列举实例,说明定性研究方法的研究步骤及其为突破目前困境所带来的契机。同时,该文还讨论了质性研究对揭示现有社会学知识体系中

的性别偏见或者盲点所作的贡献。作者认为,质性研究所揭示的不仅是一种不同的研究步骤,而且是一个知识领域的革命。它邀请新的伙伴加入知识创造的行列,期望为知识的多元化创造机会,进而带动学术界及知识创造机制的民主化(熊秉纯,2001)。

围绕着“是否存在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或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如果有,其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对社会学的传统方法论或研究方法构成怎样的挑战”等问题,吴小英系统地考察了有关女性主义方法论的争论,分析了社会学研究中当知识遭遇性别时的境况与结果。作者认为,从总体上说,女性主义对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流社会学方法论持批判态度;他们追求以批判性、反思性和参与性为特征的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规则,但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并不认为存在什么独特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而是主张方法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女性主义反对认知和文化体系中的两分法传统,认为关于定性与定量、客观与主观、理性与情感、主体与客体、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划分与男人与女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性别对立相对应,构成了有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权力等级关系,必须加以拒斥。同时作者也指出,尽管女性主义方法论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其在理论上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许多在正统的社会学范式中被忽略、被遮蔽、被扭曲的东西,在女性主义这里重新被挖掘出来或者被补充和修正(吴小英,2003)。

周华山在梳理实证主义方法论主要理念、内容以及现象学、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诠释学、符号学、女性主义对实证主义的各种批判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提出应对女性主义田野方法学进行情理兼备的反思,并提出了女性主义田野研究方法的八个具体原则。作者指出,女性主义方法学所反对的并非实证研究方法本身,而是把“客观”、“普遍定律”、“第一手资料”奉为绝对真理的实证主义。在方法学与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反思中,女性主义提出了以被研究者为本的女性主义方法学。这一方法学的目标是让被调查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过去主客(研究者与被访者)对立、研究者居高临下的精英霸权,让被访者在研究过程中最终得到力量和发言权。它针对主流学术体制的性别盲点,坚持让被研究者作为主体,以改善被研究者的生活作为研究的终极目标,以落实两性平等互重作为研究过程的基本原则(周华山,2001)。

二、对定量研究方法的探讨

从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随着对国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介绍和向西方社会学研究学习过程的进展,定量研究方法(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社会学界的关注,定量研究也逐渐成为国内社会学研究的主流特征。国内学者也不断围绕与定量研究方法相关的议题进行了探索,其中最主要的研究集中在概念操作化、测量、研究设计、显著性水平等问题上。

概念的操作化及其测量是定量研究的瓶颈。《社会学研究》发表的方法论文中,有多篇论文都关注了这一重要主题。其中既有从理论角度对操作化概念进行的分析,也有从应用角度对概念化方法、测量指标等等进行的探讨。

张小天在《论操作化》一文中,针对现有操作化理论的不足,专门对操作化的概念和有效度进行了分析。作者首先从概念上将操作化区分为“形成指标、指数或量表的过程”以及“形成测量的方法及步骤的过程”两种。然后集中讨论了第一种意义上的操作化问题。作者在对“概念”和“变量”进行区分后,从概念测量能否实现以及这种测量的可靠性问题出发,对于为什么要进行概念的操作化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在理论上指出了进行操作化和表面有效度评估的一些原则。他指出,研究者在测量变量时,这种测量能否获得以及测量的可靠性如何,会因为若干因素的不同而不同,这些因素包括:被测变量的性质、被测对象的特点、测量所利用的途径、所使用的方法、所选择的被调查者、被调查者是否了解被测变量的含义或研究者提问的含义、测量所处的环境以及被调查者是否愿意真实回答研究者的询问等。由于这种原因,讨论社会研究中的测量问题时,可以将变量分为两群,一群是社会研究者无法可靠地测出的变量,另一群是可以可靠地测出的变量。操作化就是为属于前一变量群的某个变量在后一变量群中找到对应的变量(即指标),以便能够用操作测量方法可靠地测量这个变量(张小天,1994)。

沈崇麟关注定量研究中最普遍的测量误差问题。他首先举例说明并区分了社会统计学中误差的两大类型,并在此基础上集中探讨了测量误差,即“由概念构成的维度向操作化的变量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上述两类偏差。他指出,概念的定义误差、概念的度量层次误差以

及概念的测量指标误差是发生在研究设计阶段的测量误差,因而可以叫做“设计者误差”。控制这类误差的关键在于提高研究人员的素质。另一方面,在社会研究的执行阶段也会发生各种测量误差。最主要的有被调查者未能按照调查的要求回答问题所形成的回答误差(包括有意的回答误差和无意的回答误差),资料收集后进行信息处理的误差(主要包括编码误差、过录误差、输入误差)以及抽样误差、随机误差、常量误差、相关误差等(沈崇麟,1990)。这种对定量研究中各种类型测量误差的详细分析,对于帮助研究人员提高研究质量、避免和减少这些误差的产生有很好作用。

在概念操作化及其测量的应用方面,《社会学研究》所发表的论文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许多学者结合实际研究的例子,对特定研究领域中的核心概念及其测量进行了专门的分析探讨。比如,在婚姻与家庭社会学领域,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都是重要的研究主题,而对这两个主题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的测量则是在研究方法方面十分重要的探讨内容。徐安琪在对以往中外研究文献中关于夫妻权力测量的五种模式逐一梳理的基础上,使用第二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资料,对家庭权力的测量及其与妇女家庭地位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学术反思和检讨。她认为,多维指标测量家庭权力缺乏效度和可操作性。不同指标受性别分工和权重的制约,同时,多项指标缺失值高也使得整合复合变量的难度增加。另一方面,相对权力指标在微观研究中存在一些缺陷或困扰,比如丈夫权力越少是否妻子地位就越高,权力和义务是对应一致还是对立相悖等。对此,作者建议妇女家庭地位的测量应关注两个侧面:一是个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权,二是婚姻角色平等的主观满意度。对于后续研究,作者也建议采用质化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显性和隐性的家庭权力的形成及其运作过程进行多维、动态、细致的观察、发现和由表及里的分析,以丰富和深化妇女家庭地位测量和解释的研究成果(徐安琪,2005)

人际关系则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主题之一。人际关系研究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是对人际关系的测量。李宁宁结合我国的国情,采用实验的方法,对人际关系的两种测量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参照测量法素以揭示群体中心人物见长,但其实验结果却表明,它受权力因素的影响较大,不适于在独立性差、人们有着较多交往、感情维系较为重要的团体中采用;而社会测量

法不仅在群体结构的分析方面可以大显身手,在群体中心人物的揭示方面也并不乏力。“因此,对于人际关系的测量方法的评价不是简单的,其使用的准确性受所测对象性质的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武断地宣称两种测量方法谁优谁劣,而只能结合具体情况,说明在哪些情境之下,哪种方法更为恰当。即“必须在了解对象的基础上有选择地使用”(李宁宁,1987)。

在社会学研究十分重视的社会资本与社会分层领域,有关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测量问题更是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学术界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不断扩展和应用,一些学者分别对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及其测量、社区的社会资本测量问题进行了探讨。刘林平以边燕杰等人在以往研究中所提出的企业社会资本的定義及其测量指标为出发点,在肯定其研究主要贡献的基础上,讨论了企业社会资本的內涵。通过分析,他认为边燕杰等人对企业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不太合适,“企业法定代表的社会联系并不等同于企业的社会联系,企业法定代表的社会联系或社会网络不一定为企业所用,只有有效使用的社会网络才是社会资本”。同时他也指出了边燕杰等人研究中所用的测量企业社会资本的指标也不具有效度,即其所测量的只是“法人代表的社会联系或社会网络,而不是企业的社会资本”(刘林平,2006)。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可以从测量企业建构关系网络所使用的费用来测量企业社会資本的思路,从另一个层面拓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桂勇等人针对社会资本研究领域中“具有个体特征的社会資本测量取得长足进步而集体性社会资本测量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社区社会資本的测量问题上。研究者在回顾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并建构了测量社区社会資本的多元维度,发展出各个维度的测量指标。通过对上海市50个社区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者最终得到了一个由七个维度组成、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的社区社会資本测量量表(桂勇、黄荣桂,2008)。尽管存在社区样本规模偏小等不足,但这一研究依旧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探索,其结果和结论为该领域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

尉建文等人对如何正确测量社会资本的问题进行了综述和评论。他指出,社会资本测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反映出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社会資本。对于个体社会資本的测量来说,得到普遍认可的有效工具是以职业声望分数来计算个体社会网络中所含资源的定位

法。然而,尉建文等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尽管权力和声望在一定程度上相关,但彼此具有独立性。“声望主要来源于社会的认可,并非必然与社会资源联系起来,而权力在中国社会与资源的联系更为紧密”。因此,作者提出计算个人社会资本时,应该重点测量其社会网络中的权力资源,而不是声望资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作者利用三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重新编制了职业权力分数,并将这一新的分数与职业声望分数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职业声望与职业权力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职业权力所计算出来的个人社会资本无论是在效度上还是在信度上都优于基于职业声望测算出来的结果(尉建文、赵延东,2011)。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测量中国人关系网络中所嵌入的社会资本,同时对于我国社会分层领域的研究也有进一步的深化和推动作用。

除了概念操作化及其测量,研究者们还对定量研究中的实验方法、研究设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方文针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使用非常普遍的实验研究方式,从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两个维度构造了一种社会心理研究方法的评价框架,并分析了社会心理研究中的反应性。在介绍基本的实验逻辑的基础上,作者从实验被试的代表性、实验情景的人工性、主试—被试的互动效应等方面,分析了对实验研究的种种批评。作者认为,作为一种方法,实验无法取代其他方法,也不可能被其他方法所取代(方文,1995)。孙健敏对作为社会学实证研究重要标志的研究假设及其有效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西方学者有关研究假设有效性的各种标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提出了研究假设应具备的五个条件:(1)研究假设必须在概念上清楚明了,假设的表述必须准确;(2)研究假设应该具有实证参考物;(3)研究假设必须具体化;(4)研究假设应该与可利用的技术相关;(5)研究假设应该与现有的理论有关。其观点对于社会研究者明确研究假设的重要性以及了解评价研究假设有效性的标准有较好的帮助(孙健敏,2004)。

三、对定性研究方法的探讨

在定量研究方法逐渐成为主流的同时,学界对定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的研究也始终在持续。学者们同样在对西方的学习和中国的实践中不断发掘着各种定性研究方法的作用,也

不断进行着定性研究方法的探讨。

个案研究是定性研究方法中最为常用的方式之一,也是在定量方法成为主流的社会学界备受责难的方式之一。个案研究方法遭受最多批评的问题是它的代表性。或者说是仅仅研究一个个案究竟有多大意义的问题。王宁在《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一文中着重讨论了个案研究方法的代表性问题。作者认为,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是一个“虚假问题”,“因为个案研究并不一定要求个案具有代表性”。他首先通过对代表性的含义进行界定,指出代表性是样本的一种属性;然后指出任何样本的出现都有一个前提,“即总体的范围和边界是清楚的”。而由于个案研究中并没有范围和边界明确的总体,“所以个案不是统计样本”,因而“它并不一定需要具有代表性”。在否定个案的代表性的同时,作者又通过区分两种不同的“扩大化推理”逻辑,说明个案研究采取的是一种与统计性推理不同的“分析性推理”,来达到认识某一类现象的目的。而要使个案研究的结论能够外推的关键,则是保证所研究的个案具有典型性(王宁,2002)。

同样是关注个案研究方式,王富伟在《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一文中,从“个案研究的结果同样是一项知识”的命题出发,系统分析了费孝通先生的“类型比较法”、格尔茨的“深描说”和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法”。并从“整体—部分”的维度以及“经验—理论”的维度,对三者处理个案超越问题的内在逻辑及其利弊得失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这三种取向的个案研究都有着超越个案的诉求,但三者超越的方向却有所不同。虽然三者都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个案的超越,“但却在事实层面上有着未能克服的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现实世界所持有的实体论的假定。作者认为,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对整体认知的追求,那么就需要对现实采取一种非实体论的看法,即‘关系的’(relational)本体论”。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作者提出“我们所进行的应是关系个案研究,所追求的应是关系性整体”。而“以此界定个案研究在事实层面上的超越,是一种有限,即只追求更大范围内与个案相关的事实”。在论文的最后,作者再次回到个案研究的知识命题,提出个案超越所带来的知识增长既可能是“突发式”的,也可能是“累积式”的,但都需要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同(王富伟,2012)。

深度访谈是定性研究中最为常见、也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杨善华等人从意义关联的角度对于这一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作

者在简要概述深度访谈两个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将讨论的中心聚焦在“深入事实的内部”这一本质特征上。并从意义的角度分析了与访谈有关的各种意义体系。作者结合自身实践的经验,提出了一些与深度访谈有关的操作原则,比如悬置的态度、了解被访者的日常生活、以被访者的生活史为最佳切入点、全方位的观察、辨别“意义”和“事实”、三层次的文本分析等。通过分析,作者认为,深度访谈涉及到研究者和被访者之间面对面的我群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研究者需要悬置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立场”,既要通过访谈“进入到被访者的日常生活中去”,又要“随时保持反思性的观察”。访谈的过程应以被访者的日常生活及生活史的结构为结构,以发现问题、追究问题,最后再讨论个案的普遍性意义(杨善华、孙飞宇,2005)。

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也译为典型组讨论等)是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中常用的资料收集方法之一。这种方式可以为研究者了解研究对象思想和情感提供十分独特的方式。李冬莉详细介绍了焦点小组讨论方法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操作方法,以及作者亲身参与的两个具体的研究实例。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焦点小组讨论方法的主要优点及其局限性。作者认为,相对于参与观察法,焦点小组讨论的优点是可以在较短时间和大得多的范围中获得丰富的定性资料;热烈的讨论气氛可以激发出单独访谈难以问出的意见;对误报和瞒报有一定抑制作用;相对节省费用,等等。但由于讨论组成员少,资料不能用来做定量分析;资料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人的水平与技巧;调查对象可能附和他人而不谈自己的真实想法;资料收集过程和结果的分析都很难避免研究者的主观性。这些都是焦点小组讨论方法的局限性表现(李冬莉,1998)。

四、对调查研究方法的集中研究

属于定量研究方式的调查研究方法(survey research method,国内也称为社会调查方法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学者们运用最多的一种研究方式。而有关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论文在《社会学研究》发表的方法方面论文总体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方面的研究既涉及到调查方法的基本概念,也涉及到调查方法的各个

技术环节。

风笑天针对学界在引进和学习西方社会研究方法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从基本概念上对“社会调查方法”与“社会研究方法”进行了严格区分。作者首先对国内现有的各种概念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与国外的同类概念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国内外在介绍社会学研究方法时有十分明显的差别:国内仅用“社会调查”,而国外则区分了“社会调查”与“社会研究”二者。通过对概念的定义、内容以及方法体系的进一步分析,作者得出结论:国内学者在认识上将社会调查方法等同于社会研究方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其内容体系和结构上的某些混乱现象。但实际上社会研究与社会调查并不是一回事,社会调查方法只是社会研究方法的一个部分。在严格区分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对这两种方法的内涵、体系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进行了分析,指出那种将实验研究、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与问卷法和访问法同等看待,并列作为社会调查中资料收集方法的做法是不科学的(风笑天,1997)。

随着问卷调查方法的广泛运用,学者们也开始对问卷方法的方法论背景、意义界定以及在中国社会中运用所遇到的问题展开了研究。风笑天从方法论角度对问卷调查方法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问卷调查法的广泛运用,为社会学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从思辩走向实证、从微观走向宏观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同时,作者也认为,首先,问卷调查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证的方法,这种实证的特征决定了问卷、随机抽样及统计分析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次,成功的问卷调查必须有充分的理论分析做基础,必须有明确的理论框架作指导;第三,问卷的效度是问卷调查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概念操作化的水平和质量则是决定问卷调查效度的关键因素;第四,人既作为研究的主体又作为研究客体的现实,制约和影响着的问卷调查的可靠性和适用性;最后,不同的调查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的问卷调查法的适用范围(风笑天,1994)。

卢汉龙从加芬克尔的著名实验开始,对社会调查中问卷的意义界定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加芬克尔的实验揭示出一个重要问题,即人们对世界上同一事物的认识将随着他对事物表象的各种不同意义的解释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在社会调查中,调查问卷实际上是连接和沟通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纽带,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都会对问卷中的问题和答案形成自己的一种意义解释体系。因此,研究

者在设计问卷时,必须同时了解被调查者接受调查时所使用的意义界定体系。研究者要使自己的意义界定体系与被调查者的意义界定体系尽量取得一致。而如果研究者所设计的调查问卷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没有吻合度较高的意义结构,研究结果的有效度和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卢汉龙,1987)。

李强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实践指出,在中国做问卷调查的最大难题就是频频遇到人们相互冲突的“心理二重区域”现象,即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说假话”的问题。作者指出,在人们的心理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可以对外公开的区域,另一个是不对外公开、属于自我保密的区域。而中国人的心理二重区域现象显得更为突出。在调查中,这种心理二重区域现象往往会有各种不同表现,如掩盖事实欺骗对方、两套话语体系、内外有别、失去自我、集体本位以及两套记录体系等。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心理二重区域现象的原因是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以及儿童的成长环境。而要在调查中避免这种现象给调查带来的偏差和影响,作者也从确定研究领域、设计研究问题、实地调查记录、数据分析和解释等方面提出了应该注意的问题(李强,2000)。

社会调查中,面对被调查者进行当面访问的访问员不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收集问卷资料的角色,同时也承担着保证整个调查质量的重要角色。访问员在调查过程中对被调查者的诱导性提问、催促回答以及臆答(即在访问过程中,访问员对问卷中的某些题目并不提问受访者而自行填答的做法)等现象,是影响调查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纸笔方式的面访中研究者也很难监测。严洁等人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访问员臆答现象上。作者通过对北京大学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农村成人问卷中有接近10%的访员臆答现象发生。研究者采用事后准实验设计的方法,探讨了访员臆答的发生与访员特征的关系、访员臆答如何被监测、访员臆答现象如何进行干预以及干预的效果如何等问题。研究发现,52%的访员都存在臆答现象;各类问卷中,有臆答现象的问卷比例平均为18.8%。从年龄来看,18-24岁的访员的臆答问卷比例最高;按职业分析,计生干部、村居委会干部、无业待业人员以及政府企事业单位职员比学生访员更容易发生臆答。对臆答现象进行干预的结果发现,首次干预可以显著降低臆答问卷比例,特别是对年轻访员的干预效果最好,干预后臆答比例下降最快、最大。其研究结果对于社会调查从纸笔面访向计算机辅助面访(CAPI)

过程中提高质量监控效果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严洁等,2012)。

而跟踪调查作为调查研究方式中最具因果推断价值和动态研究价值的方式,深受社会研究者青睐。研究者通过追踪调查对象个体成长历程中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健康等指标,将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直接关联起来,研究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但与此同时,跟踪调查中调查对象的流失、追踪的困难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样本估计准确性下降、样本代表性下降等等,也是令社会研究者最为头疼的问题。孙妍等人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初访数据和追访数据,分析受访对象社会经济特征与拒访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而为追踪研究中有效地进行样本维护和提高追踪调查数据的质量提供依据。其研究表明,在初访调查中已经接受访问的受访家庭中,在对其进行追访时的样本损失存在选择性问题,具体表现为拒访家庭与参访家庭在家庭结构、规模等社会经济特征变量上的显著差异。而被拒访的特点及模式与发达国家跟踪项目基本一致,即受到受访家庭主事者社会经济特征、参访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作者同时指出,由于他们所采用的数据的限制,其研究中并没有控制访员的个人特征,例如年龄、性别、经验、行为模式等因素,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受访对象的拒访发生比产生直接影响(孙妍等,2011)。

梁玉成则以“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为例子,探讨了在中国进行追踪调查的追踪损耗情况如何、有多少是样本损耗、多少是总体损耗、中国的多重社会转型如何影响追踪损耗、如何提高追踪调查质量的问题。作者在对该项调查的追踪损耗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追踪损耗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断上升的“社会转型影响假设”、农村调查出现的追踪损耗误差大于城市的“城乡差异假设”,以及年轻人口由于外出就业和分家最终不会再被追踪到的“生命周期假设”。作者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从个人与家庭两个层面证实了上述三个假设,并对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如何减少追踪损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及相关方法(梁玉成,2011)。

五、从研究方法角度进行的商榷与质疑

社会研究方法的价值集中体现在研究者接近和达到研究目标上。

而研究者在研究中对研究方法的使用,既是体现研究者学术水平和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其实现研究目标的重要保证。学术期刊作为研究者发表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还承担着对不同研究结果的检查、衡量、比较与评价的多种功能。在这方面,《社会学研究》所发表的论文也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较早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从研究方法角度进行商榷的论文是侯龙龙针对陈向明的论文所提出的“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的疑问。作者认为,陈向明的研究“不恰当地把研究者自己的问题直接交给了被研究者”,因而使整个研究结果看起来与一般的新闻采访无异。至于研究者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作者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在运用“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分析方法建构“扎根理论”时,过于强调“文化主位”的视角;二是忽视了“文化主位”视角的限度(侯龙龙,2001)。陈向明在回应的文章中针对侯龙龙文中的观点,着重从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结果的“真实性”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陈向明认为,质的研究者在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的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流派,可以被视为一个连续体,它们不是两两对立,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文化主位的限度又与研究的目的有关,如果研究目的是为了“创造思想”,使研究结论具有原创性,那么主位和客位的界限必然不甚分明(陈向明,2001)。在上述争论的影响下,阎光才撰文探讨了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真实问题(阎光才,2002)。他认为,实证主义所谓研究结果的真实,是以所预设的理论前提的可检验性为先决条件的。可是,当这一理论前提本身就是一个疑问甚至是谬误的时候,其所谓研究结果的真实或许也就不存在了。他主张,研究者有必要多多少少地走出“文化客位”的模式和思路,参与到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去理解行动者的理解,并在与行动者的互动中来体现理论的实践意义和价值,丰富理论的内涵(风笑天,2015:323-324)。

尹海洁(2000)通过揭示童星等人关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研究(童星、刘松涛,2000)中所存在的统计方法问题,对其自相矛盾的结果进行了质疑。尹文指出,在社会研究中对社会统计学的应用必须保证其应用的前提条件得到满足,如果把不具备推广价值的结论推向总体,使用无效的模型进行预测,就会出现前后自相矛盾的结果。作者通过分析假设检验应用的基本前提,指出原文所得结论无法推论总体。作者又指出原文的研究在资料收集上存在数据缺乏效度和信度的问题,

其统计分析方法上的失误导致了研究结论的错误。最后,作者认为,统计分析只是研究的手段而非目的,不能为了统计分析而做统计分析。同时,“任何一种方法的应用都有其局限性,如果超过它的使用范围来应用它,或者用不正确的方法来使用它,就可以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应该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方法的应用”(尹海洁,2000)。

在类似的另一篇质疑文章中,徐道稳针对园田茂人等学者关于职业评价的中日比较的研究(园田茂人、张汝立,2000),从资料的可比性、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原文的样本是一个非随机且严重偏态的样本,这一缺陷不但决定了中日两国资料在总体上不可比较,而且决定了其部分资料也不可比较。同时,作者指出,原文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的运用上存在错误,原文没有正确和有效地利用检验因子分析是否适用的相关矩阵中的信息,对因子命名和因子负荷的认识也十分模糊,多元回归模型的使用和表示也很不规范。作者对原文在结果分析讨论中的漏洞和结论中的随意性进行了批评(徐道稳,2001)。

围绕着调查回收率的高低以及与此相关的回收率概念的含义、计算方法以及样本规模等研究方法问题,风笑天和郝大海进行了质疑、商榷和讨论。风笑天认为,一方面,调查回收率的高低是衡量一项调查结果所具有的代表性的最终指标,因而回收率越高越好;但另一方面,由于实际调查中存在着许多制约和影响回收率的因素,如果不切实际地单纯追求高回收率可能会影响到调查资料的质量,因此回收率并非越高越好。在调查中应该对样本的完整与资料的质量予以同等关注,既要尽可能地提高回收率,也要防止和避免低质量的高回收率(风笑天,2007a)。郝大海在商榷文中认为,风笑天的论文是对中国社会调查回收率的批评,而由于这种批评是作者误读样本规模含义的结果,因此其对中国社会调查质量的质疑缺乏足够的依据。郝大海根据自己提出的回收率计算方式来计算,认为目前国内几项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应答率与国外同类调查差异不大(郝大海,2007)。针对郝大海的质疑,风笑天进行了回应(风笑天,2007b),作者指出,郝文质疑的出发点是不恰当的,风笑天(2007a)原文对样本规模的定义、对CGSS2003调查项目中样本规模的定义和理解是清楚的和正确的,并没有“误读”。反而是郝文不恰当地将“样本规模”的概念变换成“实际发生的访谈数量”,不恰当地在有关“样本规模”的讨论中引入“实地调查过程”的内容,因而

形成了对样本规模含义的不正确理解,做出了对样本规模计算的不正确划分,同时也导致了 CGSS2003 的样本规模计算以及其他调查项目回收率统计中的混乱现象(风笑天,2015:324-325)。

杨舸等人从人口调查匹配数据使用的角度,对李春玲关于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平等的研究(李春玲,2010)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李春玲的研究所使用的父子匹配数据是匹配率较低、选择性风险较高的户内人口匹配数据。通过对该匹配过程的再检验并利用再抽样和加权方法重构模型进行分析,作者发现,李春玲研究中“匹配的选择性偏差对研究模型的影响是确定的。其结果不仅会带来影响因素判断程度的错误,甚至完全改变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杨舸、王广州,2011)。针对这一质疑,李春玲进行了回应,通过比较其原文研究结果与商榷文的统计结果,说明除了少数几处小的差别外,商榷文数据分析结果支持了原文数据的主要结论和大部分结论,而商榷文提出的选择性偏差对其分析结论可能产生的最主要影响则没有得到数据证实。通过对调整数据偏差方法及其效果进行详细分析和数据论证,李春玲认为,原文与商榷文数据分析结果存在的差异并非是由选择性偏差所导致的,而是其他因素导致的。没有充分证据说明商榷文结论比原文结论更可靠。同时,考虑到原文数据与商榷文重构数据以及再抽样数据的大部分结论相同,回归系数相似,说明商榷文提出的因原文数据匹配程序有误而可能导致结论错误的观点不成立(李春玲,2011)。

上述研究论文从方法角度进行的商榷和回应不仅深化了所探讨的相关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无形中营造了一种科学的探究氛围,增强了社会研究的逻辑严密性,保证了社会研究的学术质量,是发现社会规律、促进知识增长的重要一环。

六、对新的研究方法的介绍和引进

《社会学研究》对国内社会学方法发展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对社会学研究的引领,还突出体现在不断发表引介各种新的社会研究方法的论文上。

生命历程研究方法(life course research method)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主要关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个

人生命事件。这些生命事件一般包括接受教育、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结婚或离婚、生养子女、参加工作或辞职、居住地迁徙、退休等。李强等人及时地将这一方法介绍到国内。作者在论文中就生命历程研究的基本概念、历史发展、分析范式、理论应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综述,列举了生命历程研究在越轨社会学中的应用实例,并对生命历程研究中常用的“事件史分析”统计方法进行了深入的介绍。最后,作者对在中国场景下引入和开展生命历程研究的意义进行了阐述。作者认为,现代中国剧烈的历史变动和社会变迁与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视角相契合。离开对社会变迁对生命轨迹之影响的考察,很难对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做出完满的解答;同时,生命历程研究范式可以帮助我们从小问题”来做“大文章”,即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注、对一些具体社会过程的考察,来把握个人生命历程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强等,1999)。

在“新计算社会学”(new computational sociology)首次提出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社会学研究》就发表了罗玮等人的介绍文章。作为在美国大学学习社会学的学生,论文作者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新计算社会学研讨会”,在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写成论文,向国内社会学界及时介绍了这一最新的社会学发展动态,特别是在大数据背景下,社会学与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相互结合的发展动态。作者借用美国社会学家的话指出,社会学的发展之所以艰难,主要是因为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十分艰难的过程。而新计算社会学的目标正是要借助相关的新技术、新工具、新手段,克服以往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各种缺陷和障碍,提高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系统回顾这一艰难过程的基础上,作者详述了新计算社会学的五大相关内容:即大数据的获取与分析、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融合、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实验研究、计算机社会模拟研究以及新型社会计算工具的研制与开发等。作者最后指出,从新计算社会学与传统社会学研究比较的角度出发,能够更好地认识新计算社会的特性与发展前景(罗玮、罗教讲,2015)。

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对人们社会生活的覆盖和渗透,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为应对互联网带来的虚拟环境对研究方法的挑战,学者们开始探索将互联网作为新的研究田野和工具进行定性研究的可能。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方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用来探讨与互联网关

联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新的研究工具。卜玉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此进行了介绍,从互联网与文化的关联出发,按虚拟田野的定位、在线参与观察的实现、线上田野作业向线下的拓展以及研究伦理几个方面,对虚拟民族志所牵涉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作为一种建基于传统民族志而又与之有所不同的研究方法,虚拟民族志首先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田野”,即将非实体的虚拟社区及其具体表现形态作为研究的田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也不再是面对面的交流,因而参与观察的方法必须有所调整。同时,虚拟民族志方法的讨论也将随着互联网自身的发展以及研究的需要而变得日益重要(卜玉梅,2012)。

如果说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之争一直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一大特征的话,那么,两类研究方法的混合运用是否必要,又是否可能呢?针对这一问题,朱迪以其所做的消费模式研究为例,探讨了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的混合研究方法。作者首先回顾了有关混合研究方法的若干争论,指出不同的定量与定性结合方法背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含义也不同。在强调要了解混合研究方法所蕴含的方法论含义的同时,作者指出有关混合研究方法的争论实际上也提醒研究者,应当根据研究的目的、资料的类型、甚至研究者的资质来选择一种合适的策略,系统地连接资料和合适的资料分析方法。作者通过总结自己的研究发现指出,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研究的结论,而且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能够提高研究发现的可靠性和深入性(朱迪,2012)。

内生性问题是社会科学定量分析,特别是因果推断中所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常见方法主要包括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简称IV)、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简称FE)、倾向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称PSM)、实验以及准实验(experiments and quasi-experiments)等等(陈云松,2012)。针对内生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胡安宁对于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倾向值匹配方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对于社会学调查研究的意义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一个具体实例,展示了倾向值匹配方法的实施过程。同时,作者从密尔对因果关系的论述以及统计学的反事实框架(counterfactual framework)出发,阐释了倾向值匹配方法是如何通过“控制”混淆变量、满足非混淆假设(unconfoundedness)来帮助研究者

提出因果性结论的。此外,作者还把倾向值匹配的方法与其他比较常用的因果推论方法,比如回归中断设计和工具变量方法等进行了简要的对比,展示出倾向值匹配方法相对于其他方法特有的优势。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作者简要分析了倾向值匹配方法的局限性,并对倾向值匹配方法的最新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胡安宁,2012)。

作为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另一种重要手段,工具变量也是基于调查数据进行因果推断的一种前沿方法。陈云松专门撰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了介绍。作者用尽可能浅显的语言,简要说明了工具变量的定义、原理及估算方法,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实证分析中较为常见的五类工具变量进行了回顾和梳理,为今后的研究寻找工具变量提供了参考。同时,作者对工具变量估计量的权重性特征进行了阐述,并结合实例展示了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因果推断的基本步骤和要点。最后,作者还就工具变量方法的潜力和局限性进行了剖析。他指出,“发现和使用工具变量,既能展示研究者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逻辑力、想象力和诠释力,但同时也会把研究最薄弱的环节(无法验证的外生性)直接展示给学术界。因此,工具变量既是展示社会科学想象力的舞台,也是可以让一篇论文失去价值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所有的工具变量方法使用者都应该小心谨慎,清楚地说明所需假设,清楚地说明一旦工具变量外生性假设不能满足,估计量会发生偏移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把理论上的直觉和前人使用工具变量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让我们的逻辑、想象和诠释,为社会科学定量分析中的因果推断提供更强的说服力和更高的可信度”(陈云松,2012)。胡安宁和陈云松两位作者对倾向值匹配和工具变量方法所进行的介绍和评述,对于国内学术界了解、认识和借鉴两种新的方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七、总结与未来的期望

回顾三十年的历程,笔者在认识到《社会学研究》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更是深深感受到这样一本学术期刊对于中国社会学在研究方法领域的发展和提高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特殊意义。笔者认为,《社会学研究》所发表的方法论文总体上具有比较高的学术质量。这些论文不仅涉及到社会研究方法各个层面的主要议题,

同时也密切关注了我国社会学界的现实研究。从方法论到具体方法和技术,从定量研究到定性研究,这些论文都有所涉及。同时,既有对西方前沿方法的介绍和评价,又有结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探讨;既有从方法视角对相关研究的质疑和商榷,也有对一段发展时期中的利弊得失的回顾与总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从“补课”学习、积极实践到走向逐渐成熟的整个过程,它所发表的这些方法论文也从最初的“雪中送炭”逐渐充实到“查缺补漏”和“锦上添花”。可以说在社会学发展的每一个时期中都恰到好处地为社会学界(以及国内社会科学界)的研究者们送上了与实际研究密切相关的方法知识和科学思维,帮助他们在实际研究中澄清迷雾,启发他们更加科学地思考和更加严密地论证。总之,《社会学研究》及其所发表的方法论文在推动和引领国内社会研究方法领域的不断进步、促进国内社会研究水平的迅速提高上,做出了积极的、不可或缺贡献。

当然,在看到《社会学研究》在社会研究方法领域做出上述贡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相对于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对社会学研究的更高要求,以及相对于社会学学科自身发展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更多需求来说,我们还有进一步努力提升的空间。从这一点出发,笔者对《社会学研究》也有下列两方面的期望。

首先,坚持并适当增加社会研究方法领域论文的数量和比例。从三十年来《社会学研究》发表的方法论文数量及其比例来看,每年6期中平均只有3篇方法论文的比重还是显得相对太小。无论是社会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各种理论问题,还是实际社会研究中所面临的各种具体方法问题,抑或是国际前沿的方法发展问题,都有必要及时得到国内社会学界同行的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特别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特定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等因素,对社会研究的各种方式、具体方法和研究技术所产生的问题,都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进行专门的探讨和研究,也需要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社会学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对研究方法的这种探讨和交流,不仅可以增强社会研究者对各种方法的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研究者的方法意识与方法修养。这种方法意识,可以让研究者“在探索一个具体问题或接触一项实际研究时,思想上能够随时意识到‘要从方法的角度作些分析、判断和选择’”。这种素养则能够使我们明白,“对各种不同的研究问题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以及采用这种方法的好处和局限。这种素

养还能使我们在思考所研究的现象和问题时,自觉地从探讨的可行性、设计的周密性、方法的合适性等角度来进行综合判断,从而有效地帮助我们“从问题走向答案”(风笑天,1999)。这种方法意识和方法修养才是保证我们的社会研究水平整体提高的关键要素。同时,社会学方法与社会学理论一样,是整个社会学学科不断发展和水平提高的基础。只有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方法两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扎实、丰硕的研究成果,社会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才会更快、更好。

其次,进一步加大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社会学经验研究的高权、质疑与回应的论文数量。如果说前一点期望更多地是侧重于加强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认识的话,那么,这一点期望则是更多地侧重于研究方法的应用。学术研究的本质或者说终极目标是增加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或者说是增加有关各种社会现象、社会规律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的创造所依赖的只能是科学的研究方式及其所提供的正确的研究结果。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社会研究都会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面临产生多种错误、疏漏的危险。无论是论证的逻辑、证据的收集方式,还是具体的研究工具和研究过程,每一个研究者都会或多或少地在一个或者多个方面出现或大或小的偏差或错误。而任何一方面的偏差或失误都可能带来错误的结果和认识。因此,从研究方法角度对社会研究的结果进行考察、衡量、高权和质疑,既是保证众多社会研究成果基本质量的重要学术环境,也是推进各个领域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一种重要学术机制。在这方面,作为社会学界学术交流阵地的《社会学研究》杂志同样承担着重要的使命。

参考文献:

- 卜玉梅,2012,《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社会学研究》第6期。
- 蔡禾、赵巍,1994,《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辨析》,《社会学研究》第3期。
- 陈向明,1997,《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社会学研究》第6期。
- ,2001,《文化主位的限度与研究结果的真实》,《社会学研究》第2期。
- 陈云松,2012,《逻辑、想象和诠释:工具变量在社会科学因果推断中的应用》,《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方文,1995,《重审实验》,《社会学研究》第2期。
- 风笑天,1994,《方法论背景中的问卷调查法》,《社会学研究》第3期。
- ,1997,《社会调查方法还是社会研究方法?——社会学方法问题探讨之一》,《社会学研究》第2期。
- ,1999,《社会学者的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007a,《高回收率更好吗?——对调查回收率的另一种认识》,《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07b,《再谈样本规模和调查回收率——对〈应答率的意义及其他〉一文的回应》,《社会学研究》第6期。
- ,2015,《社会研究:科学与艺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桂勇、黄荣贵,2008,《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郝大海,2007,《应答率的意义及其他——对中国“高”调查回收率的另一种解读》,《社会学研究》第6期。
- 侯钧生,1995,《价值立场与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社会学研究》第6期。
- 侯龙龙,2001,《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同陈向明博士等商榷》,《社会学研究》第1期。
- 胡安宁,2012,《倾向值匹配与因果推论:方法论述评》,《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李春玲,2010,《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11,《数据误差的调整效果的评估——对杨舸和王广州商榷文章的再商榷》,《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李冬莉,1998,《简评典型组讨论方法的应用》,《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李宁宁,1987,《人际关系的两种测量方法——社会测量法与参照测量法的对比分析》,《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强,2000,《“心理二重区域”与中国的问卷调查》,《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强、邓建伟、晓箏,1999,《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李小方,1988,《从狄尔泰到韦伯——评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梁玉成,2011,《追踪调查中的追踪成功率研究——社会转型条件下的追踪损耗规律和建议》,《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林彬,1992,《论社会学方法的发展趋势》,《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刘林平,2006,《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反思和测量途径》,《社会学研究》第2期。
- 卢汉龙,1987,《调查问卷的意义界定》,《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罗玮、罗教讲,2015,《新计算社会学: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彭玉生,2011,《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沈崇麟,1990,《社会研究中的量度误差问题》,《社会学研究》第2期。
- 孙健敏,2004,《研究假设的有效性及其评价》,《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孙妍、邹艳辉、丁华、严洁、顾佳峰、邱泽奇,2011,《跟踪调查中的拒访行为分析——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为例》,《社会学研究》第2期。
- 童星、刘松涛,2000,《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测定》,《社会学研究》第4期。
- 王富伟,2012,《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社会学研究》第5期。
- 王宁,2002,《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第5期。
- 王天夫,2006,《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尉建文、赵延东,2011,《权力还是声望?——社会资本测量的争论与验证》,《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吴小英,2003,《当知识遭遇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社会学研究》第1期。
- 熊秉纯,2001,《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徐安琪,2005,《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徐道稳,2001,《也谈科学的方法应予以科学的应用——与园田茂人、张汝立商榷》,《社会学研究》第2期。
- 严洁、邱泽奇、任莉颖、丁华、孙妍,2012,《社会调查质量研究:访员臆答与干预效果》,《社会学研究》第2期。
- 阎光才,2002,《也谈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真实”》,《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园田茂人、张汝立,2000,《职业评价的中日比较——SSM调查与哈尔滨市调查的比较分析》,《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杨舸、王广州,2011,《户内人口匹配数据的误用与改进——兼与〈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平等〉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杨善华、孙飞宇,2005,《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尹海洁,2000,《科学的方法应予以科学的应用——与童星、刘松涛商榷》,《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张小山,1991,《实证主义社会学面临挑战》,《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张小天,1994,《论操作化》,《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张杨,2007,《证伪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吗?》,《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周华山,2001,《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方法学反思》,《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朱迪,2012,《混合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研究策略及应用——以消费模式研究为例》,《社会学研究》第4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杨可